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及其溢出效应*

李向阳

【内容提要】 在借鉴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国际经济合作中安全因素的影响并将其内生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显示，安全化现象始终存在，只是不同时期的安全化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呈现周期性特征，并与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在企业层面表现为投资者的偏好发生改变，企业决策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与效率优先目标；在民族国家层面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不惜以经济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安全目标；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以价值观为导向，强调与所谓“志同道合者”开展合作。究其原因，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新技术应用等外生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加剧等内生因素都会对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产生影响。其中，发达国家精英阶层对安全化“叙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新一轮上升周期将派生出一系列溢出效应，包括国际经济合作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碎片化显现、国际分工的收益向供应链链主倾斜以及经济压舱石效应式微等，因此需要从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国际经济合作的运行模式。

【关键词】 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全球化；全球供应链；安全因素内生化

【作者简介】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6）10-0043-17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主流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是，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在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这种分工与比较优势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换言之，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市场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模式。然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现实中始终存在，尤其是近 20 年来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为便于分析，本文把所有非经济因素统称为安全因素。由此派生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安全因素的影响究竟是一种随机的外生冲击，还是一种持续的内生冲击？如果是前者，经济因素将决定国际经济合作的均衡状态，在理论上可以排除安全因素的影响；反之，如果是后者，安全因素与经济因素将共同决定国际经济合作的均衡状态。由于经济学理论假定并不存在非经济因素的影响，[①] 因此可以借助国际关系学中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将（广义的）安全因素内生化，有助于我们对国际经济合作的运行机制与走向做出更符合实际的判断。

一、文献综述

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与现实主义安全观不同，[②] 哥本哈根学派以建构主义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将安全视为一种社会话语建构过程，而非客观既定的军事威胁。具体而言，安全化是权威主体或安全化施动者通过话语行为将某一公共议题建构为对特定指涉对象的存在性威胁，在获得受众认可后动用超越常规的政治程序和紧急手段进行处置，使议题从普通政治议程上升为安全议程的社会化过程。[③]

基于这种定义，安全化主要由四个核心要素组成：一是安全化施动者，即拥有话语权威的精英、政府、国际组织和媒体等构成了发起安全化话语的主体；二是指涉对象，即被宣称面临生存威胁的对象；三是功能性威胁建构，即把普通议题渲染为生存性、不可逆转的危机，制造紧急性与必要性；四是受众认同与非常规行动，

① 严格来说，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忽略安全（非经济）因素，而是把它视为一种随机的外生变量，因此并没有对安全（非经济）因素进行专门的研究。

② 现实主义安全观以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权力至上和安全领域的零和博弈为核心，把安全界定为国家生存与主权独立，维护国家的物理存续是其首要目标，因而强调军事硬实力与自助自保的能力。与之相对，自由主义安全观未将无政府状态必然等同于冲突，强调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合作共赢、非军事安全和多元行为体，认为安全可以实现正和博弈、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依靠的不是军备对抗，而是规则、合作和一体化。本文重点关注与借鉴的是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安全观，因此没有把其他学派的安全化理论纳入文献综述。

③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 《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只有获得受众主体间的认可，安全化才算成功，进而采取超出常规立法和行政流程的特殊治理措施。

由此可见，安全是主体间共识，而非客观真理。换言之，安全是主体间的产物，既不是纯客观，也非纯主观，而是社会互动与话语博弈的结果。同一事件既可以被建构为安全威胁，也可以被淡化为非安全威胁。安全化是例外状态的特殊政治，并非常态善治。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去安全化”，将议题重新拉回常规政治协商、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轨道，避免长期借“安全”之名压制多元诉求与正常政治博弈。①

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划分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大领域。其中，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化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成为该学派关注的热点议题。② 经济安全化是指将经济议题通过话语建构的方式转化为威胁国家生存、主权或稳定的安全问题，从而为国家干预、实施保护主义乃至制裁措施提供合法性依据。经济安全化的本质是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即霸权国借安全的名义切断经济网络联系，以此削弱对手的实力。③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实现了安全研究的语言学与社会学转向，突破了传统军事安全的狭隘视角，为解读非传统安全议题、话语政治和政策例外状态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但该理论因过度放大语言建构的作用而饱受学界批评。此外，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界定的主观化还派生出一个新问题：安全化是否会成为施动者的一种主观随机行为？既有研究未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发生的频率及其背后的机制进行解释。因此，本文在研究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过程中借鉴哥本哈根学派关于社会话语建构过程的理念，对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进行重新定义，使之符合经济学逻辑，同时也尝试厘清社会话语建构过程背后的决定机制。

二、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周期性

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在于各国存在不同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这些要素与国家安全没有必然的关系。换言之，选择哪些国家、哪

①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6-88.

②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 21-48.

③ 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83—10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些产业、哪种产品以及以何种方式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并不需要考虑安全因素。这些议题之所以能够被安全化，是因为施动者（精英阶层）可以通过社会话语建构的方式把国际经济合作的后果转变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进而使相关议题从普通经济议程上升为安全议程。在这种意义上，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实际上是把经济因素建构为安全因素的过程。安全化导致的结果是，国际经济合作受安全因素（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回溯国际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安全化程度并不是一个常量，不同时期安全化的程度差异很大。如在战争时期，除军工贸易外，民用品贸易也被赋予安全属性，因而国际贸易只能发生在同一军事集团内的国家之间。[①]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贸易就是如此，甚至在重大经济危机期间也是如此，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的主要国家分裂成不同的货币—贸易集团，如英镑区、美元区和法郎区等。基于安全的考虑，不同国家集团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往来被人为割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合作受安全因素的影响大幅下降，但由于存在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双方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往来被赋予安全属性。以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程度大幅降低，从而进入一个“超级全球化”时期，这也是一个“去安全化”的过程。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一个新的拐点，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被再次强化。由此可见，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具有周期性特征，尽管这种周期并不像经济学意义上的商业周期那样具有规范性。[②]

回顾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安全化与经济全球化存在着反向周期性同步。[③] 经济全球化的上升期对应的是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下降期，反之亦然。如在 1990—2008 年的“超级全球化”时期，安全化的程度降到了最低，以至于国际社会盛行“世界是平的”以及跨国公司“无国籍论”等理念。[④] 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已不存在明显差异，国际经济合作不再对本国安全

① 罗纳德·芬德莱、凯文·H. 奥鲁克著，施诚、薛宁译《国强国富：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② 有关安全化周期的形成机制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但“钟摆效应”在安全化周期的形成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为实现安全目标而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过大时，“去安全化”将会发生，反之亦然。

③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学界一般将其称为全球化，而在中国学界常见的表述是经济全球化。本文在此不做进一步区分。

④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等译《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第二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William J. Holstein，et al.，“The Stateless Corporation，”*Business Week*，May 14，1990，pp. 98-10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构成威胁。当全球化处于下降周期时，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便呈现出不断上升之势，“泛安全化”日趋严重。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经济全球化现状与走势的判断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分工深化，贸易投资增长，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终结，致使“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再全球化”等名目繁多的概念应运而生。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全球化概念的不同界定。主流观点把全球化界定为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的跨境流动。[①] 这种跨境流动背后的驱动力来自技术进步等生产力因素，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属性。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其生产关系的属性，即影响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规则与秩序。[②] 这种规则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参与者之间的收益分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反过来，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后，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质疑恰恰是针对后者提出的。特朗普政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多边贸易体制损害了美国利益，因此美国要放弃多边主义与全球化。之所以把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视为这一轮全球化周期的拐点，正是基于人们对这种规则和秩序的质疑与反思。这场危机直接促使人们把矛头指向美国的金融机构，由此掀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扩展到英国、法国和日本等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中心。“占领华尔街”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对“超级全球化”的质疑。

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与周期性，本文认为，现阶段的安全化正处于一个周期性的调整期，其突出特征表现为两点：一是作为全球化规则基础的多边主义已形同虚设；[③] 二是全球贸易增速已明显放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与形式的增加、技术广泛迅速的传播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7页。世界银行将全球化界定为社会与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过程，由运输成本降低、观念快速传播、资本流动上升和移民压力增强等因素共同驱动。参见世界银行编写组编，陈伟译《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3页。

② 李向阳《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载《求是》，2018年第21期，第61—63页。

③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目前该组织的三大职能均处于停摆状态：一是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平台，自2015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放弃多哈回合谈判后几乎没有再发挥作用；二是作为监督成员贸易行为的机构，当大型经济体无视通报自身政策义务时，世界贸易组织对此行为束手无策；三是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因对上诉机构职权和运作存在分歧而陷入瘫痪。参见Michael B. G. Froman, “After the Trade War: Remaking Rules from the Ruins of the Rules-Based System,” *Foreign Affairs*, Vol. 104, No. 5, 2025, pp. 60-9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纪中，全球贸易增速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速的2—3倍。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大致相当，在某些年份甚至低于经济增速。① 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投资的利益分配、结构分布与合作模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就成为一个自然的选择。② 在这种意义上，“再全球化”是多数国家的共识，各国只是对“再全球化”的方向缺乏共识。

承认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周期性在逻辑上将派生出两个重要判断：其一，安全化不是对既有运行模式的暂时偏离，也不会随某个国家执政党或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逆转。其二，安全化并不只是体现在政府与国家层面，还体现在企业层面。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是企业行为，政府的安全政策最终要通过企业和市场来实现。这有别于既有的经济安全研究。③ 有鉴于此，下文从多个层面来探讨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表现形式及形成机制。

三、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表现形式

与军事、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安全化不同，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除体现在政府层面与国家层面外，还体现在企业层面。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企业是合作的基础，民族国家政府是合作的主体，国家间互动是合作的表现形式。

第一，安全化在企业层面表现为投资者偏好的改变，企业决策目标偏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效率优先原则。

主流经济学理论假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行为的目标，效率优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由于它不承认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周期性，因而将安全化视为对股东利益最大化和效率优先的暂时偏离。较为常见的说法是“资本逐利论”，即资本的唯一属性就是利润最大化，其他行为都是对这一根本属性的暂时偏离。

在实践中，企业决策目标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和效率优先原则已成为现实。

---

① Cristina Constantinescu，Aaditya Mattoo and Michele Ruta，“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Cyclical or Structural?”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5/wp1506.pdf.

②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指出，由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国际秩序已难以为继，为此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特恩贝里体系”予以替代，该体系服务于具体的国家利益，而非多边机构的模糊愿景。参见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Op-Ed by Ambassador Jamieson Greer：Why We Remade the Global Order，”https：//ustr.gov/about/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5/august/op-ed-ambassador-jamieson-greer-why-we-remade-global-order。

③ 孔繁颖、李巍：《从互惠走向互搏：经济要素“武器化”与国家经济安全》，载《外交评论》，2025年第3期，第31—56页；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83—10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019 年 8 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 181 家企业首席执行官共同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指出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公司宗旨宣言》宣称要替代以往的商业圆桌会议宣言，并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做出五项承诺：一是为顾客传递价值，二是对员工投入，三是公平和道德地与供应商进行交易，四是为公司涉及的社区提供支持，五是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①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标志着企业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② 利益相关者理论上既包括股东，也包括经营者、雇员、债权人、债务人和上下游客户，还包括政府与社区等。这意味着企业决策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以牺牲股东的利益，由此便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目标函数。一旦接受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安全化就不再仅仅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和效率优先的暂时偏离。从理论上看，安全因素由此从外生因素转化为内生因素。

近年来，流行的“近岸外包”“离岸外包”“友岸外包”“制造业回归”等企业行为都反映了企业对安全的考量与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背景下，企业决策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是最为明显的标志，因为韧性的核心就是安全。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关税”后，美国与许多国家达成的关税协议中都有一项名为“追加投资”条款的重要内容，即通过承诺向美国追加投资来换取低关税率待遇。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在美日签署的关税协议中，日本政府承诺将对美国投资 5500 亿美元。③ 具体实施程序包括五方面内容：其一，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投资委员会，负责推荐和监督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哪些项目“被认为有助于促进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拥有最终决定权。其二，美日双方指派代表组成咨询委员会，为投资委员会提供项目建议。其三，美国投资加速器办公室负责投资项目的执行、管理与运营。其四，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信贷或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为私人融资来源提供的贷款担保可以进入特殊目的实体（SPV），然后再从特殊目的实体流向公司开展的项目。其五，在日本企业贷款偿还完成之前，美日两国将对该项

① “Business Roundtable Redefines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 to Promote ‘An Economy that Serves All Americans’,” https://www.businessroundtable.org/business-roundtable-redefines-the-purpose-of-a-corporation-to-promote-an-economy-that-serves-all-americans.

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公司宗旨宣言》是资本主义治理的里程碑，正式宣告了股东至上主义的阶段性终结。参见 Michael Spence, “The End of Shareholder Primacy?” *Gulf Times*, August 27, 2019。

③ “Inside Trump’s $550bn ‘Shakedown’ of Japan Inc.: Tokyo Signed the US President’s Biggest Deal Yet. Will the Investments Ever Materialise?” https://www.ft.com/content/78d16000-83ae-4cf4-ba0f-6668c37e415e.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目利润进行均分，此后利润将按照90%分配给美国、10%分配给日本。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利润分配环节的安排。日本企业不仅要按照美国的要求选择投资项目，还要将投资利润的大部分无偿让渡给美方。在2026年2月美日签署协议时，日本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将这些投资包装成对项目的“意向表达”，旨在避免向本企业的董事会提交审批文件。这种看似违反市场原则的企业决策行为正在变成现实。①

第二，安全化在民族国家层面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盛行，政府以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国家安全”。

与自由贸易主义相对应的是经济民族主义，其核心目标是民族国家利益优先、本土产业优先以及维护经济主权本位。当这些目标被建构为国家安全议题时，一国的经济利益就开始让位于安全利益。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趋势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产业政策的回归。欧盟的产业政策由来已久。近年来，欧盟围绕“欧洲绿色协议”以及数字与半导体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如《绿色协议工业计划》（2023年）、“为欧盟重新供能”方案（2022年）、“清洁工业协议”（2025年）、《欧洲芯片法案》（2023年）和《工业加速器法案》（2026年）等。一般而言，美国政府并不承认存在产业政策，但近年来将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挂钩，因而获得了发展的“合法性”，如出台《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2021年）、《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和《通胀削减法案》（2022年）等。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认为，产业政策无疑会带来效率损失，但这是为保卫国家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为国家安全等基本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时，经济扭曲是必要的，效率考量反而要退居次要地位。②

二是出台众多“本国优先”的贸易投资政策与立法。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特朗普宣布对美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无论是其关税水平还是影响范围都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未见的。作为受害者一方，欧盟本应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但其以维护供应链安全、技术主权之名推出了一系列排他性的贸易投资法规。如欧盟为摆脱对外部晶片的依赖，提出了采用欧洲本土产品的替代方案。欧盟“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主要包含两项核心立法提案：一是推出《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以加快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部署，二是推出《欧洲芯片法案》以加强半导

① 匿名审稿人提出，这种不成比例的利润分成主要源自美国作为掠夺型霸权对日本的压榨。这一判断在国家层面是成立的，但在企业层面反映的是由于受安全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企业行为偏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② Stephen Miran, “Brittle Versus Robust Reindustrialization,” https://media4.manhattan-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brittle-versus-robust-reindustrialization.pdf.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体供应安全。此外，欧盟还积极推动公共机构更多地使用开源软件解决方案以获得更大的控制权和灵活度。在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因实施相关供应商替换而带来巨额成本支出的问题上，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防务和空间的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Thomas Regnier）表示，并非所有事情都只是金钱问题。由于欧洲当前高度重视安全因素，该修订案的核心在于确保太阳能板、通信、核能和医疗卫生等多个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以保护欧盟利益及欧洲消费者，确保欧盟在多个战略领域的供应链安全。①

三是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果说产业政策的回归、出台“本国优先”的贸易投资政策与推进立法等措施是防御性行为，那么实施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则纯粹是一种进攻性举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高端芯片领域实施对华出口限制、在重要的运输通道实施非商业性限制（也被称为通道武器化）都属于这种类型。②

第三，安全化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价值观导向，声称要与“志同道合者”开展合作。

以价值观为导向曾一度被认为是按意识形态划界的具体表现。自特朗普执政后，价值观的内涵便发生了变化。“志同道合者”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推崇的概念。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已经放弃了与“志同道合者”合作的理念，考虑的只是经济利益，但这显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判断。尽管“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是特朗普推崇的基本理念，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价值观。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观为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宣称自己是西方文明的“维护者”，到第二任期则演变为西方文明的“传承者”，③ 这意味着他至少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在国际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明确放弃了多边主义，同时对区域主义也并不关心，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便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他更加热衷于诸边主义，即谁签署协议就对谁生效。2025 年 12 月美国提出的“硅和平”倡议就是诸边主义的典型案例。该倡议本质上是一个由美国主导但无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承诺型联盟，其核心目标是重构关键矿产—能源—制造—芯片—人工智能—物流的全链条，进而形成排除中国的闭环供应链。“硅和平”倡议的基本逻

① 《获外交部、欧委会回应；千余家媒体报道商会最新 CSA2 报告传播影响实现突破》，http://www.ccceu.eu/2026-05/18/c_4984.htm。

②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 “The Weaponized World Economy: Surviving the New Age of Economic Coercion,” *Foreign Affairs*, Vol. 104, No. 5, 2025, pp. 8-23.

③ 李向阳《反全球主义思潮与贸易集团化的发展趋势》，载《国际经济评论》，2025 年第 4 期，第 9—15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辑在于强调从“效率全球化”转向“韧性结盟”，以政治信任优先，通过联盟化供给降低对华依赖。“硅和平”倡议对成员采取邀请制，需要符合“民主价值观+技术实力+供应链互补”的标准。目前已从最初的7个成员扩展到24个。[①] 需要指出的是，该倡议要求成员对未来供应链所生产的产品支付“安全溢价”。也就是说，即便价格高于其他来源同类产品的价格，相关成员仍需要优先购买该机制提供的产品（如稀土）。

在欧洲，国际经济合作的价值观导向更为明显。在2022年《欧洲芯片法案》颁布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洲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如美国或日本）在芯片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她看来，这关乎平衡的相互依存，也关乎可靠性。[②]

麦肯锡研究院提出的地缘政治距离概念有助于衡量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价值观导向。[③] 地缘政治距离将两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外交立场分歧用联合国大会重要投票量化成0—10分的一维指标，两者的分差即为地缘政治距离。基于这种投票数据可以构建一维地缘政治立场光谱。任意两个经济体的地缘政治距离可定义为两者在该光谱上得分之差的绝对值。按照该定义，一国与它国的地缘政治距离越短，表明其贸易合作对象越集中于“志同道合”的国家。麦肯锡研究院202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2025年全球贸易的地缘政治距离年化变动率为-0.9%。[④] 这表明“友岸化”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

综上，国际经济合作不同层面的安全化往往交织在一起，国家层面上的合作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企业层面，而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导向反过来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因此，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多重影响。

四、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动因

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逻辑，安全化的动因是安全化施动者把议题建构为“生存威胁”，从而突破常规政治程序并动用特殊紧急手段以争夺政策资源、凝聚国内共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x Silica,” https://www.state.gov/pax-silica.

② “Statement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the European Chips Ac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da/statement_22_866/STATEMENT_22_866_EN.pdf.

③ Jeongmin Seong, et al., “Geopolitics and the Geometry of Global Trade,” https://www.mckinsey.com/mgi/our-research/geopolitics-and-the-geometry-of-global-trade#/.

④ Tiago Devesa, et al., “Geopolitics and the Geometry of Global Trade: 2026 Update,” https://argaamplus.s3.amazonaws.com/3a36a888-07b3-4a75-9077-78f3437f1214.pdf.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识、巩固自身权威以及排斥对立群体等。应用到经济领域，安全化的逻辑仍然成立。鉴于此，本文把影响安全化的动因划分为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这种划分取决于是否由经济系统自身机制所决定。收入分配可被归入内生因素，而战争、疫情、自然灾害和技术进步等可被归入外生因素。

（一）来自内生因素的驱动

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是当今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呈现出四方面特征：其一，发达国家财富（存量）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收入（流量）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其二，无论是财富还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美国在七国集团中都是最高的。其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国家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的国民收入份额都有所增加，虽然这种收入不平等趋势自2010年以来似乎已经趋于平稳，但这并不是对不平等趋势的逆转，因为最富有的10%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而中等收入群体与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在缩小。换言之，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水平正在总体下移。新冠疫情的冲击、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国际冲突的增加导致全球极端贫困率有所上升。其四，全球劳动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的61%降至2025年的53%，资本收入的份额却从39%上升到47%。这反映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恶化趋势。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机制未能改变这种趋势，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福利国家模式对此也束手无策。①

西方学界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但大部分西方学者并不接受这种观点。② 为此，他们另辟蹊径试图构建一套新的“叙事”，并最终为安全化研究奠定基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归结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克鲁格曼明确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出现了错误，低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对发达国家就业和不平等造成的影响。③ 美国的贸易逆差被视为外国“抢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贸易不平衡与美

① Lucas Chancel, et al.,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 https://wir2026.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6/04/World_Inequality_Report_2026.pdf.

②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是一个例外，他把财富不平等加剧归因于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参见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③ Paul Krugman, “What Economists (Including Me) Got Wrong About Globalization,”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business/2019/Oct/10/what-economists-including-me-got-wrong-about-globalization-2045710.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国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便由此挂钩。最终，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被建构为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驱动力，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种叙事逻辑。

（二）来自外生因素的驱动

外生冲击虽然具有随机属性，但也会加剧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进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2022 年乌克兰危机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对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冲击等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些冲击都是随机分布的，它们被安全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

推动“超级全球化”发展的微观基础是全球供应链的不断延长，其背后的逻辑是：跨国公司基于效率优先原则要求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从而使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体现了从国家间的分工到产业间、产品间的分工乃至生产工序之间的分工。分工的深化与供应链的不断延长带来了以中间品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增速加快。近年来，这一趋势正受到两类外生因素冲击的影响：一是在外生冲击分布不变的情况下，供应链越长，受外生冲击影响而中断的风险也越大；二是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劳动的替代效应远高于以往，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意愿逐渐降低。麦肯锡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2007—2017 年多数产业的贸易密集度（出口/产出）都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前的上升趋势形成了鲜明反差。其中，替代效应在全球创新性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①] 这表明技术进步导致全球供应链的缩短。

这种客观的外生冲击是如何被安全化的？巴黎学派的“场域”（field）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解释。场域是指由相互依赖但相互区分的元素组成的社会空间，当一群施动者为争取某种稀缺资源进行结构性斗争时就会形成场域。[②] 只有在特定的场域内，某一议题才能被成功地安全化。例如，有美国学者在讨论供应链主权时提出，冷战的结束为跨境经济的融合提供了机会，而中国在此过程中不仅成为重要的全球供应商，还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在当时并没有被视为一种风险。而在今天看来，与中国经济的互联互通和相互依赖已被欧美国家视为“地缘政治的首要

① Susan Lund, et al.,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innovation/globalization%20in%20transition%20the%20future%20of%20trade%20and%20value%20chains/mgi-globalization%20in%20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full-report.pdf.

② Vincent Pouliot and Frédéric Mérand, “Bourdieus Concepts: Polit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becca Adler-Nissen, ed., *Bourdie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thinking Key Concepts in IR*, Routledge, 2012, p. 3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风险”。①

在欧洲也存在类似的叙事。为确保欧洲的数字主权，德国和法国共同推出欧洲联邦云（GAIA-X）项目。该项目旨在开发一个独立的云计算系统，以提供更好的隐私和安全性。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欧洲的价值观和经济竞争力构成了客观的威胁，但在围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辩论中，美国并没有成为问题的核心，中国却被定位为“主要竞争者”。在对中美形象的不对称描述中，欧盟政策界提到了既定的地缘政治想象，这些想象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更大的“安全威胁”，美国则更多地被描绘成一个“经济对手”。②

在“超级全球化”阶段，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的可靠参与者，但现在将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源”。西方国家把提高供应链韧性的出路解读为“去风险”，进而把“去风险”进一步解读为“去中国化”。实现“去中国化”的途径是让制造业回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进而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合作机制。

（三）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互动

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相较于外生因素，内生因素在精英阶层对安全化的叙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关注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效率对公平的损害足够大时，安全化就会提上议事日程；反之，当公平对效率的损害足够大时，去安全化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公平与效率的钟摆效应将有助于解释安全化的周期性现象。外生因素对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影响在总体上是随机的，是否将其建构为安全议题则取决于安全化的周期性或场域的改变。

综上，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受制于多重因素和机制。个人、企业与国家的行为目标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将经济议题建构为安全议题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五、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溢出效应

将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安全因素内生化必然会引发溢出效应。相较于“超级全球化”时期，国际经济合作未来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

---

① James Andrew Lewis，“Supply Chain Sovereignty and Globalization，”https：//www.csis.org/analysis/supply-chain-sovereignty-and-globalization.

② Linda Monsees and Daniel Lambach，“Digital Sovereignty，Geopolitical Imaginaries，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uropean Identity，”*European Security*，Vol.31，No.3，2022，pp.377-39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资源错配与国际分工收益降低

依照经济学逻辑，安全化或安全化程度提高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错配的过程，背后的机制大致有三类：其一，政府的产业政策、关税政策、出口管制措施和保护性贸易投资政策会导致价格扭曲，市场的价格机制信号效应也会随之降低。其二，基于安全化的全球供应链重塑或调整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国际资本不再必然流向资本边际收益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其三，国际秩序与规则出现重塑（如旧秩序与规则正在失效，而新秩序与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尤其是作为规则制定者与维护者的大国，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会提升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最终导致国际分工的整体收益下降。不过，学界围绕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尚不成熟，这里只能提供零星和间接的证据。

针对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而进行的福利损失评估，迄今并无系统性和规范化的研究结论。全球贸易与创新政策联盟（GTIPA）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实施“解放日”政策①一年后美国关税政策产生的全球影响。调查显示，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引发的全球价值链调整将导致全球平均生产成本上升3%—5%，这部分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同时，价值链的区域化也降低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会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②

鉴于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全球价值链碎片化日趋严重。欧洲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模拟了这种碎片化带来的福利影响，结果显示：在基线情形下，全球福利水平会降低0.5%；在刚性情形下，这一比例将达4.6%。③

2026年1月，欧盟发布了《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计划在5G通信、半导体和电力系统等18个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所谓“高风险供应商”的组件与设备。欧盟委员会还提议允许在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国际咨询机构毕马威受中国欧盟商会委托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欧盟相关措施一旦实施，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将被排除在欧洲市场外，而欧盟27国到2030年可能面临高达3678亿欧元的累计经济损失。④

①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4月2日签署了第14257号行政命令，旨在通过征收全面的“对等关税”来大幅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并将这一天定为“解放日”。

② Stephen Ezell and Rodrigo Balbontin，“The Aftermath of the 2025 U. S. Tariffs：How Countries Are Adapting to an Uncertain Global Trade System，”https：//www2. itif. org/2026-trump-tariff-aftermath. pdf.

③ Francesco Paolo Conteduca，et al.，“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VCs，”https：//papers. ssrn. com/sol3/papers. cfm？abstract_ id=5252856.

④《欧盟若禁用中国电信设备 未来五年恐损3678亿欧元》，载《联合早报》，2026年5月7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和诸边主义

在全球经济领导者放弃多边主义的背景下，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宣布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后，区域主义和诸边主义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流机制。除构建诸边协议外，从特朗普 2025 年 4 月 2 日签署第 14257 号行政命令开始到 2026 年 6 月，美国已经同 15 个国家或经济体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包括框架协议）。虽然这些协议本身并不是自由贸易区协定，但具有类似的功能，只是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欧盟则在此期间先后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与乌克兰签署了《深度全面自贸区协定》（DCFTA）升级文本、与新加坡签署了《数字贸易协定》（DTA）、与墨西哥签署了《现代化全球协定》（MGA）、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了伙伴关系协定（EMPA）及临时贸易协定（ITA）、与印度完成了自贸区谈判、与阿联酋完成了自贸区谈判等。

如果考虑众多中小国家为应对美国的“关税战”而制定的各种“备份方案”，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可能会形成更多类型的合作机制。未来是否会形成以主要市场为核心的贸易集团，则取决于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大国博弈的结果。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碎片化必然会引发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进而提高国际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

（三）收益向供应链“链主”倾斜

“超级全球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是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途径。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的收益分配状况。经验研究显示，一国向更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位置转移与其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总中心性[①]每增加 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大约会提高 0.08%，这种关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例如，一个经济体如果要从孟加拉国 2023 年的中心性水平提升到韩国的中心性水平，其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提高约 3.2%。这说明后向中心性和前向中心性也显示出积极的关联性，且后向中心性的关联性更强。[②]

随着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程度提升与经济全球化周期性调整，全球价值链的短链化与本地化趋势将逐步加强，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极有可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客观上也将

① 总中心性是指前向与后向中心性的平均值，即距离供应链中心或顶端的距离。

② ADB,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sian Development Policy Report 2026,”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1143716/adpr-2026-highlights.pdf.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全球供应链的收益会更多流向作为“链主”的发达国家。

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还会通过两种机制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的差距会持续拉大。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收益分配将面临制度性难题。在人工智能企业内部，资本和极少数技术人员获取了绝大部分收益，这种情况已引发严重的劳资纠纷。2026 年 5 月韩国三星公司罢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三星公司虽然获得巨额利润，但长期以来无法惠及普通工人，进而引发了工人的不满。这一争端最终以资方向劳方做出让步而得以解决。在一国之内，不同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绝大多数民众不仅无法分享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巨额收益，还会面临随时丧失就业机会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做出非正式表态，希望人工智能头部企业通过公共财富基金让普通民众分享人工智能产业的红利。① 这种做法在一国之内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但在国际范围内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未来全球范围内基尼系数的提高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四）经济压舱石效应式微

经济合作的“压舱石效应”表明，两国之间只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合作，双边关系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其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合作通过加强国家间联系，能够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构建共同体的机制和集体认同，减少国家间的误解与误判并增加互信，最终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务卿科迪尔·赫尔（Cordell Hull）在 1948 年表示，不受阻碍的贸易与和平相辅相成。② 但统计分析显示，自 2000 年以来共有 57 项实证研究探讨了贸易对战争与和平产生的影响，其中只有 16 项研究支持“贸易普遍促进和平”的乐观观点，有 1 项研究发现贸易反而会引发冲突，有 9 项研究认为贸易对战争与和平没有影响，其余 31 项研究则认为贸易有时能预防战争，有时会引发战争。③

在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背景下，经济合作本身就包含了安全属性，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成为大国竞争的一种常态。同时，大国之间更容易陷入现实主义意义

①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napping Up Stakes in Private Companies. Could A. I. Be Next?” https://www.nytimes.com/2026/07/13/business/economy/trump-equity-stakes-ai.html.

②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1, Hodder & Stoughton, 1948, p. 84.

③ Stephen G. Brooks, “The Trade Truce? Whe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Does—and Doesn’t—Promot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103, No. 4, 2024, pp. 141-14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上的安全困境。当交易的一方按照地缘政治的逻辑行事时，另一方不可能按照自由市场逻辑予以应对。在这种意义上，安全化会有螺旋式上升的内在机制，即一方为增强自身防御力量会被另一方视为潜在威胁，并采取相应的制衡措施，最终导致整体安全水平下降。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安全化行为取得成功，行为主体就会动员一个受到威胁的“我们”来反对一个所谓的具有威胁性的“他们”，从而把“我们”这个团体团结在一起。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民众、企业和政府对所谓的外部“威胁”正在形成统一的认知，而这些机制最终都会阻碍经济压舱石机制发挥作用。

六、结论

借用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把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安全因素内生化，从而把安全因素纳入企业与政府的决策行为。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周期性意味着安全因素不再是短暂的外生冲击，而是一种影响长期均衡的内生冲击。针对安全化周期性的形成机制，尽管本文引入了钟摆效应对其进行解释，但总体上还是一种经验描述，其内在的机理仍有待深入研究。以安全化为前提，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的改变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因此需要采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与适应国际经济合作的运行模式。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去安全化”符合全球的共同利益，而探寻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周期演变规律是推动“去安全化”的第一步。

本文只是对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研究做了初步尝试，有关安全化周期的长度、拐点及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如效率与公平的钟摆效应能否解释历史上安全化周期性的所有拐点、大国兴衰的周期性是不是一个更深层的决定因素等议题还需要继续探究。①

（责任编辑：赵远良）

① 感谢吉林大学李晓教授提出未来可继续研究的议题。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diplomacy, investiture-tributary system, nation-state system,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thor】LI Kaisheng, Senior Fellow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Securi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ts Spillover Effects

LI Xiangyang (43)

【Abstract】This paper draws on the securitization theory of the Copenhagen Schoo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on-economic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o endogenize security factor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ws that securitization phenomena have always existe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ecuritization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exhibiting cycl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ituting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securi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entered a new upward cycle. At the corporate level, this is manifested as changes in investors' preferences and a deviation of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goals from shar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 and efficiency-first objectiv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n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which governments trade off economic interests for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t is reflected in value-oriented cooperation with so-called "like-minded" partners.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include both exogenous factors, such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endogenous factors, such as the exacerb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these, the narrative of the elite clas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regarding securit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new upward cycle of securit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ll generate a series of spillover effects: reduced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emergence of fragm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nisms, the tilt of benefi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oward lead firms in supply chains,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ballast effec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operation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securi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penhagen School, globalization, global supply chain, endogenization of security factor

【Author】LI Xiangyang, Academic 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Allocation of "Pain": A Mechanism-Based Explanation of Sovereign Debt Default

WANG Xueying (60)

【Abstract】Since 2020, a wave of sovereign debt defaults has swept across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defaults on foreign-currency-denominated sovereign debt and advanc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allocation of "pain". The framework holds that, when caught in a repayment predicament, a debtor country confronts two options: domestic fiscal austerity or external default. The former allocates the "pain" to its own citizenry at the cost of a disaffected populace that may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ncumbent rule; the latter allocates the "pain" to international creditors but entails consequences such as capital flight. The debtor country generally chooses the policy path with the lower expected cost, thereby making the choice between domestic austerity and default outcomes. To test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employs a mixed-methods desig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greater a country's domestic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less inclined the debtor country is to default externally—a negative correlation found mainly in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